

# 朱熹本《大学》中的本末次序问题

刘泽乾 1900016943

**【摘要】**本末次序问题在《大学》原本中有占有重要地位。本末次序问题超越《大学》文本本身，在朱熹思想体系中上升到自觉的方法论层面。但是，学界对朱熹思想内的本末关系的讨论尚且不够深入。本文通过关注《大学》内本末次序重要性之升降、本末次序与次序之别、本末次序何以成立三方面问题，解释朱熹《大学》中的本末次序。

**【关键词】**《大学》；朱熹；本末次序；格物致知

## 一、略论《大学》版本差异

《大学》一书，有古本与改本之分。古本的发展脉络大致是：《大学》本为《礼记》中的一篇。在由汉宣帝时期戴圣所编《礼记》，经郑玄作注，唐代孔颖达在编纂《五经正义》时根据郑玄注重新注疏的注疏本《礼记》中的注疏本《大学》就是古本大学。这个版本的《大学》经程朱改本之后不受重视，在明代反对程朱理学的思潮中又被重新重视，尤其被王阳明所提倡。

宋代以后，《大学》的地位提升，理学家为了接续道统，更加重视《大学》。二程修改了旧《大学》。明道先生将“诚意”章中的“《康诰》曰”、“汤之《盘铭》曰”、“《诗》云”三章前移，修改为对三纲领的阐释。伊川先生将文本分为三纲八目和对三纲八目的阐释两段，更有条理。另外将亲民解释为新民。

朱熹的改本，建立在二程改本的基础之上。相较于二程的改本《大学》，朱熹改本《大学》有两个显著特点：从内容上来说，朱熹增添了“格物致知补传”一章；在结构上来说，朱熹版本《大学》明确区分了经、传。相较于注疏本《大学》更有纲目性。

## 二、本末次序问题的重要性

本文研究本末次序问题有以下三个原因，前两点是从重要性方面说，第三点是从必要性方面说：

一、本末次序问题在《大学》原本中有占有重要地位。《大学》明确的给定了修齐治平、定静安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三个次序。而在《大学》经传给定的本末次序中，存在着一些逻辑困难，朱熹用与其思想体系一以贯之的方法解决这些逻辑困难，形成了有朱子特色的《大学》解释。

二、本末次序问题超越《大学》文本本身，在朱熹思想体系中上升到自觉的方法论层面。一方面，朱熹认为经典学习本身是有次序的。首先要阅读四书。而在四书内部也有次序。郭齐认为，朱熹晚年有两种四书次序的划分方式：“一是从便于治学出发，排列为《大》、《论》、《孟》、《中》，或《论》、《孟》、《中》、《大》；二是从反映作者先后和体现“道统”出发，排列为《大》、《论》、《中》、《孟》”<sup>1</sup>。不过，主流的次序还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朱熹认为，《大学》乃为学之纲领，在为学次序中处于最先的位置；另一方面，朱熹极为重视纲要。改本《大学》分为经传，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区分纲要。朱熹与门人弟子还编撰《资治通鉴纲要》，也体现了朱熹对纲要方法的自觉。本末次序与纲要思想有分不开的关系。

三、本末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学界重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体用论。但是，学界对本末关系的讨论尚且不够深入。一方面，在理学中，本末次序论在工夫论视域中始终处在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对本末论的

<sup>1</sup> 郭齐：《朱熹〈四书〉次序考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一些批评，如本末分离，认为本末论就是抹杀“末”的作用的看法还值得商榷。因此，有必要对本末次序问题进行研究。

### 三、朱熹《大学》中的三重次序结构

《大学》中有三纲领：“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纲领各自引发了一系列次序。“在明明德”引发了“物格……身修”的次序；“在亲民”引发了“身修……天下平”的次序；“在止于至善”引发了“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次序。

这三重次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并列的，而是嵌套的。最大的一个次序是从明德到新民的由内圣及外王的本末次序结构。在这个次序中，修身为本，治国为末，“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第二重次序是修身次序，这其中是格物致知为本，知至意诚心正为末。明德为本，格物致知以“明明德”，是本中之本；第三重次序是止于至善引发的，由知止到能得的一系列次序。这一系列次序大致可以在大纲上对应到知至意诚。“知止至能得，是说知至、意诚中间事”。但是，其中却有精微的区别。

《朱子语类》载：“‘定、静、安、虑、得与知至、意诚、心正是两事，只要行之有先后。据先生解安、定、虑、得与知至似一般，如何？’曰：‘前面只是大纲且如此说，后面却是学者用力处。’”<sup>2</sup>

由此可见，朱熹根本上区分“定、静、安、虑、得”与“知至、意诚、心正”两个序列。前者是无能动性的，后者是有能动性的。

在《大学》三序列中，为政次序曾经占据过最重要地位。如，郑玄就认为，“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sup>3</sup>。有宋一朝，士大夫成为政治的中坚力量，实行高度中央集权，“齐家”、“治国”不再具有封建制和门阀政治条件下的家、国强大和实在的政治力量，含义发生了重要转变，难以再直接地成为为政的方法指导。科举制的流行和文官士大夫的地位上升，使得读书人可以参与到治国活动中来，为政序列的重要性就被修身序列取代了。二程提出：“格其非心，使无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sup>4</sup>，二程对“格君心”说法的重视直接使得士大夫能在安于己位的条件下实现最高的政治抱负。这使得《大学》面对的对象就大大的被扩大了。《大学》也实现了从帝王圣明之学到士大夫之学的最基本纲领的大转变。朱熹认为：“一般资质好底人，便不须穷理、格物、致知。此圣人作今《大学》，便要使人齐入于圣人之域。”<sup>5</sup>就表明了这种变化。

### 四、本末次序和次序

本末次序与次序之间存在差别。区分本末必然要求区分次序，但并不是所有次序关系都是本末关系。本末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虽然本对末有着限制性的作用，但是本末均具有一定的能动性，从工夫论角度上说，做工夫的用力程度需要重视本，但是并不代表否定末的作用，本和末都需要下工夫。

修身次序是《大学》中最最重要的一个本末次序，因此，我们从修身次序中的本末关系来分析这个问题，也就是分析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的关系。

在修身次序中，格物致知为本，诚意正心为末。对朱熹比较普遍的批评是认为朱熹强调过于强调格物致知，而忽视诚意正心。本文认为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有其本末次序，但是也要看到诚意正心的重要能动作用。

<sup>2</sup>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297页

<sup>3</sup> 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63页

<sup>4</sup> 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0页

<sup>5</sup>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第252页

首先，本末关系不是绝对先后关系，朱熹强调的先后是在逻辑上的辩证的先后关系，在实存层面上并无先后。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朱熹对本末次第关系的论说上。如朱熹对理气关系的论说、对仁义礼智四德之间关系的论说，都有这个特点：

“说为学次第，曰：‘本末精粗，虽有先后，然一齐用做去。且如致知、格物而后诚意，不成说自家物未格，知未至，且未要诚意，须待格了，知了，却去诚意。安有此理！圣人亦只说大纲自然底次序是如此。……’”<sup>6</sup>

“舜功问：‘致知、诚意是如何先后？’曰：‘此是当初一发同时做底工夫，及到成时，知至而后意诚耳。不是方其致知，则脱空妄语，猖狂妄行，及到诚意方始旋收拾也。’”<sup>7</sup>

第二，本末次序中，本对末有着限制性的作用。务本方能达末。在限制性作用的意义上，本成为本。

朱熹认为：“‘知至而后意诚’，须是真知了，方能诚意。知苟未至，虽欲诚意，固不得其门而入矣。惟其胸中了然，知得路径如此，知善之当好，恶之当恶，然后自然意不得不诚，心不得不正。……”<sup>8</sup>

由此可见，在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这对本末关系中，本对末是限制性的因素，格物不通，如何用力，也达不到意诚的境界。

第三，本末次序中，本对末只是限制性的作用。达到本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在末上下工夫。本末两端都需要下工夫，都具有能动性。

：“问：“诚意莫只是意之所发，制之于初否？”曰：“若说制，便不得。须是先致知、格物，方始得。人莫不有知，但不能致其知耳。致其知者，自里面看出，推到无穷尽处；自外面看入来，推到无去处；方始得了，意方可诚。致知、格物是源头上工夫。看来知至便自心正，不用‘诚意’两字也得……”<sup>9</sup>

本末次序中，本末两端皆有能动性，本对末起着限制性和约束性的作用。对于一般次序来说，则不必如此。例如：修身次序是一个本末次序，定静安虑得次序则无本末。在知止到能得的序列中，只有止于至善这个起点是有能动性的，在此处下工夫即可，后续定、静、安、虑、得都是自然而然的、被完全决定的部分。朱熹只用节次、次第等词而未用过本末一词来描述这一序列。

：“‘陈子安问：‘知止至能得，其间有工夫否？’曰：‘有次序，无工夫。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见。只知止处，便是工夫。’”<sup>10</sup>

由修身本末次序和定静安虑得一般次序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具有能动性、要不要在之上做工夫，是区分末和一般次序中的在后者的的重要特征。

## 五、格物致知作为本末次序之本何以可行

今人颇多以格物致知附会科学精神，并且在以科学精神解格物致知的前提下，误用陆王，批评朱熹支离，然而格物致知本不是科学精神，致知也不是客观知识。如果将致知的知理解为客观知识，就会将知的对象扩大和无限化，格物致知之说就会出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何时是个头的问题。

首先，朱熹继承程子“脱然贯通”的思想，表明格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曰：‘格物最是难事，如何尽格得？’曰：‘程子谓：‘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某尝谓，他此语便是真实做工

<sup>6</sup>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300页

<sup>7</sup>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303页

<sup>8</sup>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302页

<sup>9</sup>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301页

<sup>10</sup>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第280页

夫来。他也不说格一件后便会通，也不说尽格得天下物理后方始通。只云：‘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个贯通处。’”又曰：‘今却不用虑其他，只是个‘知至而后意诚’，这一转较难。’”<sup>11</sup>

这种贯通式认识论之所以能够成立亦必须有一以贯之的理的前提，必须构建“知”之间的统一性和一致性。现代社会科学精神下的“知识”则不具备这种统一性，而强调分工和专业性。因此贯通式理解的前提是理一分殊，虽然有万事万物，气禀不同，但是理是一致的。这保证了知之间的一贯性，为格物致知积累后的融会贯通提供前提。

：“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格物，是零细说；致知，是全体说。”<sup>12</sup>

朱熹强调，格一物需格透，却无需将万物格遍。因为朱熹的格物是由理之分殊求“理一”之理的过程，所以讲究一个透，去在万物之气中求超越气的理，而不必要将种种不同的气禀理会个遍。

“或问：“致知须要诚。既是诚了，如何又说诚意？致知上本无‘诚’字，如何强安排‘诚’字在上面说？”“为学之始，须在致知。不致其知，如何知得！欲致其知，须是格物。格物云者，要穷到九分九厘以上，方是格。”<sup>13</sup>

其次，朱熹虽然赞同“脱然贯通”的贯通式理解，却也认为理是可以穷尽的，理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人力可达的有限的。

“龟山说：“只‘反身而诚’，便天地万物之理在我。”胡文定却言：“物物致察，宛转归己。见云雷，知经纶；见山下出泉，知果行之类。”惟伊川言“不可只穷一理，亦不能遍穷天下万物之理。”某谓，须有先后缓急，久之亦要穷尽。如《正蒙》，是尽穷万物之理。”<sup>14</sup>

这种人力可达的有限性隐藏的前提是道德的本体化。理就是性，就是仁义礼智。

“或问：“明德便是仁义礼智之性否？”曰：“便是。””<sup>15</sup>

朱熹将不变的仁义礼智本体化的同时，也将如何实现性的过程问题排除出知的范围之外。朱熹明确区分了虑与知的区别。明确限定了知的范围。

“刘淮叔通问：“虑与格物致知不相干。”曰：“致知，便是要知父止于慈，子止于孝之类。虑，便是审其如何而为孝，如何而为慈。至言仁则当如尧，言孝则当如舜，言敬则当如文王，这方是得止。””<sup>16</sup>

由是可见，朱熹格物致知的对象是非常明确和有限的，就是仁义礼智的理想道德要求。这给了性内容，可以排斥佛老之空说，更确立了格物致知的方法论。

“问：“格物之义，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穷格。然如吕氏、杨氏所发明大本处，学者亦须兼考。”曰：“识得，即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穷得也。若只说大本，便是释老之学。””<sup>17</sup>

陆九渊作为儒家，也讲仁义礼智，然而做工夫的方法论却与朱熹大不同，多次被朱熹贬斥为释学。此处，朱熹以理之表里精粗证格物致知之必要。求之于心固然能得大略得个理，然而却体会不到理的表里精粗之全体，必须求之于格物致

<sup>11</sup>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八，中华书局，1986年，第392页

<sup>12</sup>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291页

<sup>13</sup>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294页

<sup>14</sup>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八，中华书局，1986年，第401页

<sup>15</sup>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八，中华书局，1986年，第260页

<sup>16</sup>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279页

<sup>17</sup>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290页

知。

《语类》：“或问：“‘理之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分别取舍无不切。’既有个定理，如何又有表里精粗？”曰：“理固自有表里精粗，人见得亦自有高低浅深。有人只理会得下面许多，都不见得上面一截，这唤做知得表，知得粗。又有人合下便看得大体，都不就中间细下工夫，这唤做知得里，知得精。二者都是偏，故《大学》必欲格物、致知。到物格、知至，则表里精粗无不尽。””<sup>18</sup>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接受朱熹道德本体论的前提之下，朱熹以格物致知为核心的修身次序是可以成立的，可以自圆其说的。至于道德本体论本身是否成立，则是另一个问题。

---

<sup>18</sup>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324页